《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三期
2008 年 12 月　頁 205-244

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根據〈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獎後在日台文壇接受狀況的評論資料，探討殖民宗主國讀者和殖民地讀者對殖民地文本的接受過程，以期了解他們如何閱讀評價該篇作品，關注文本接受的歷史性，考察接受者和接受活動的歷史環境與歷史條件，梳理出戰前〈植〉在中央文壇和殖民地文壇的接受狀況與爭議之處，重新思考作者、文本、讀者三者間的關係。

日、台讀者的閱讀理解〈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方式，亦因讀者個人的思想背景和預期理解的差異，而產生迥異的閱讀詮釋結果。因此，本文首先介紹〈植〉的獲獎背景。其次，分析作者龍瑛宗的創作動機及說明文本中所呈現的文學主題，接著分別探究日本讀者和台灣的讀者如何理解〈植〉一作，在殖民地文本接受史的脈絡裡，說明殖民地文本在宗祖國和殖民地讀者的閱讀顯現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歧異性，以期理解殖民地作家身處在兩個文壇夾縫裡，如何尋求可能的發表空間及其尷尬處境。

關鍵詞：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殖民地文本、讀者批評、閱讀

2008 年 8 月 13 日來稿；2008 年 12 月 3 日審查通過；2008 年 12 月 12 日修訂稿收件。

The Evaluation of Colonial Test: An Analysis of "A Town with Papaya Tree"

Wang Hui-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Comment material bases on the novel, " A Town with Papaya Tree" the colonial text after awarding the prize, discussing the accepting process to colonist and others been colonized. In the hope of understanding how they read and appraised the nove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investigate the background setting and then analyze the acceptation and dispute of the central literary circle and the colonized literary circle. The thesis will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 text and reader.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readers about the text, evoke man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wn in reader's thoughts and expectation difference. Hence, the thesis will display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the text first. Moreover, discuss the motivation in Long, Ying-zong's writing and describe the theme. Finally, talk about readers in Japan and in Taiwan how to comprehend it.

In the colonial text history acceptation, emerg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readers' diversity of criticisms. The thesis tries to understand colonial authors living in the crack of the two worlds, how to publish and how to live are all embarrassed.

Key words: "A Town with Papaya Tree", colonial text, readers' criticism, reading

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
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

前言

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植有木瓜樹的小鎮〉[1]堪稱是篇經典之作，四〇年代前期龍瑛宗的文學創作雖更形成熟，但〈植〉的知名度卻遠超過其他篇章，幾乎成為他的作家代稱。相較於楊逵的〈送報伕〉[2]，台灣讀者因較易取得《改造》雜誌而得以閱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因此它的獲獎引起多方的關注，成為當時日台文壇間的話題之作。因此，本文擬以「讀者批評」的觀點，彙整〈植〉獲獎後在日台文壇接受狀況的新出土資料，探討殖民宗主國讀者和殖民地讀者對殖民地文本的接受過程，以期了解他們如何閱讀評價該篇作品，關注文本接受的歷史性，考察接受者和接受活動的歷史環境與歷史條件，梳理出戰前〈植〉在中央文壇和殖民地文壇的接受狀況與爭議之處，重新思考作者、文本、讀者[3]三者間的關係。

從「接受理論」（reception thoery）的觀點而言，讀者在文學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應被冷落，因為沒有讀者，就沒有所謂的文學文本，因為它們是在閱讀實踐的過程中具現出來的顯義過程（processes of signification）。而閱讀過程永遠

1　各段第一次出現〈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時，以全名記之，其他則以〈植〉代之。

2　根據河原功的研究，楊逵的〈送報伕〉雖然入選《文學評論》徵文，但是在台灣島內關於〈送報伕〉的內容介紹和作品評論卻寥寥無幾。其最大的理由為：被禁發行的〈送報伕〉沒有絲毫可以進入台灣閱讀市場的可能。即使有閱讀的意願，也無從正規的管道取得刊載〈送報伕〉的《文學評論》雜誌。見〈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伕」——隻身力搏台灣總督府的楊逵〉，《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中：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2004 年 6 月）。

3　本文所指稱的讀者，乃意指撰文批評〈植〉一文的評論者，受限於資料，尚未取得一般讀者的閱讀心得。

是動態的，是時間之流中複雜的運動與展開。讀者將某些「預先理解」帶入作品，這些是有些隱約關聯的信念和預期，而作品的種種特點就在其中受評估。同時，讀者都有其社會和歷史的定位，此一事實會深深具體決定他們如何詮釋文學作品[4]。日、台讀者的閱讀理解〈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方式，在中日戰爭的前夜，因讀者個人的思想背景和預期理解的差異，而產生迥異的閱讀詮釋結果。因此，本文首先介紹〈植〉的獲獎背景。其次，分析作者龍瑛宗的創作動機及說明文本中所呈現的文學主題，接著分別探究日本「讀者」和台灣的「讀者」如何理解〈植〉一作，在殖民地文本接受史的脈絡中，說明殖民地文本在宗祖國和殖民地讀者的閱讀顯現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歧異性，以期理解殖民地作家身處台日文壇夾縫裡，如何尋求可能的發表空間及其尷尬處境。

一、關於〈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獲獎背景

（一）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前後）的日本文壇

納普（日本普羅作家同盟）於一九三四年二月自行解散後，具組織性的普羅文學運動隨即消失，過去在普羅文學運動中活躍的普羅作家們因遭到鎮壓或選擇轉向，作家們幾乎噤若寒蟬。在純文學方面，卻開始呼籲「文藝復興」。《文學界》（1935 年 8 月）和《文藝》（1935 年 11 月）等文藝雜誌紛紛在此時創刊，舊世代作家們的創作活動也逐漸復甦，媒體出版業界亦隨之相呼應，創設芥川賞、直木賞等各種文創獎項，刊行《文藝復興叢書》（1934 年）[5]。

但是此時，日本政局中法西斯主義的氣焰卻日漸高漲介入文學場域，如一九三五年的文藝懇談會獎，雖然審查委員投票的結果，決定由島木健作獲獎，但是因他的「左翼傾向」，該獎項卻被迫更易，改由橫光利一、室生犀星獲得。由於這樣不當的選評情況外洩，內務省又設立著作權審查委員，使人意識到文

---

[4] Terry Eagleton 著，吳新發譯，〈第二章　現象學、詮釋學、接受理論〉，《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1999 年 12 月），頁 97-115。

[5] 東郷克美，〈文芸復興期の模索〉，《時代別日本文學事典　現代編》（東京：東京堂出版，1997 年 5 月 20 日），頁 101。

藝統制的黑手已開始入侵文壇和媒體出版界，因而引起文壇騷動[6]。一九三七年四月，適逢中日戰爭前夕，法西斯主義更形猖獗之際，改造社的選評委員應亦有所顧忌下，而選定〈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獲獎。

（二）《改造》與懸賞創作獎

《改造》內容主要分成「論文欄」、「中間欄」、「創作欄」三欄並立的編輯形式。戰時體制日漸強化的情勢下，在滿洲事件之後，一九三七年年末人民戰線事件中激進的教授團體一同被逮捕為止的數年間，「論文欄」的執筆者以勞農派人士為主。「中間欄」為強調雜誌的可讀性，因而執筆者的身分不拘。「創作欄」主要以純文學為主，改造社在發行《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之後，雜誌社與作家的關係更形密切，也因而使「創作欄」更為富活力而充實。雜誌不只是提供作品發表的舞台，同時也因編輯者與作家間深厚的信賴關係，進而激發鼓舞作家的創作精神，生產更多優秀的文本。例如：由於《改造》編輯的耐心等待，使得志賀直哉在中斷近十年後得以繼續完成唯一的長篇小說《暗路夜行》。因此，雜誌社的經營方針對作家養成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龍瑛宗繼朝鮮作家張赫宙之後，成為第二位殖民地出身的得獎作家，獲獎後也曾有一段時間與改造社往來密切，從山本社長與龍瑛宗往返的書信中，可窺見他對龍瑛宗這位新人作家的提拔與愛護之處，同時在一九三七年至太平洋戰爭期間提供龍瑛宗在該社雜誌的發表空間[7]。

《改造》懸賞創作獎設立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之前每年定期舉辦，但在一九三九年的第十屆之後卻停辦。大雜誌創設創作懸賞徵稿，《改造》開風氣之先。依慣例評選結果和獲獎作品皆會刊載於《改造》。獎金，一等獎一千五百圓，二等七百五十圓。〈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因為是佳作，獎金只有五百圓。第一屆由編輯部先進行初選，再請正宗白鳥、佐藤春夫、藤森成吉三人作最後的評選，但第二屆之後只由編輯部進行評選[8]。

---

6 高見順，《昭和文學盛衰史》（下）（東京：福武書店，1983 年 3 月），頁 94。

7 請參閱拙文〈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之旅〉，《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期（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 年 4 月），頁 29-58。

8 出席者有横關愛造、瀧井孝作、濱本浩、上林曉、深田久彌、大森直道，見〈《改造》の

（三）進軍日本文壇的雄心

龍瑛宗一直都有閱讀從日本內地進口的《改造》、《新潮》、《中央公論》、《文藝》等雜誌的習慣。同時，他也注意到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發行的文藝雜誌《福爾摩沙》、及張文環的〈父之容顏〉（1935 年 1 月）入選《中央公論》（50 卷 1 號）的新人獎外佳作的消息[9]。他雖未留日，但與留日作家呂赫若、張文環等人一樣，以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為其文學志向[10]。被日本文壇認定為「作家」，堪稱是三〇年代台灣新興日語作家世代們共同曾有的文學大夢。因此，他對日本雜誌的興趣遠大於台灣島內發行的文藝刊物，而直接參與《改造》懸賞創作獎的徵文，企求取得中央文壇的入場券。

龍瑛宗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任職於南投台灣銀行。他以個人所體驗的苦惱與絕望，及日台差別待遇等經驗為題材。每天早起利用上班前的時間，撰寫一、二張四百字稿紙，其間共花費了三個半月才完成〈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作。

（四）獲獎消息的流傳

《改造》第九屆懸賞創作獲獎作品的消息發表，可見於當時日台的新聞廣告欄中。日本內地的報紙，如三月十九日的《東京朝日新聞》的第一版的廣告中，「《改造》毅然．壓倒性的豪華陣四月號」和「《日本評論》的戰爭號」佔了全部的版面。其中《改造》題字的上部還特地印製「第九回懸賞創作發表」的字樣。而三月二十日的《大阪朝日新聞》第一版、三月二十一日的《大阪每日新聞》第三版中並排著「《改造》壓倒性豪華陣春季特大號」和「《文藝春秋》的四月特別號」等字樣的廣告。而此二則《改造》廣告的內容相同。其他的新聞報章也同時在二十日前後刊載《改造》、《中央公論》、《日本評論》、《文藝春秋》等雜誌的廣告，而《改造》懸賞創作獎的作品「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很醒目地被標示在廣告文中。

三十年（わが編集記者時代を語る本社出身作家の座談會）〉，《改造》第 31 卷第 4 號（創作三十周年記念號，1950 年 4 月）。

9 龍瑛宗，〈我的第一篇小說〉，《書香廣場》14，1988 年 1 月 1 日。

10 下村作次郎，〈台灣芸術研究會の結成—《フォルモサ》の創刊まで—〉，《左連研究》第 5 輯（左聯研究刊行會，1999 年 10 月）。

在台灣的《台灣日日新報》則於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晚報第一版中即刊載《改造》四月號的廣告，其中除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外，尚有知名作家廣津和郎的〈友情〉、島木健作的〈妻の問題〉、志賀直哉的連載小說〈暗路夜行〉等人的作品同時被收錄於《改造》四月號中。

在眾多主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龍瑛宗以處女作〈植〉一文耀眼地躍入日本文壇，成為繼張赫宙之後，備受矚目的殖民地作家。

三、〈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創作意圖與書寫主題

戰後探討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相關評析論述的文章頗多[11]，但本文試圖回歸歷史脈絡中，探討作家的創作意圖和文本的書寫主題。

（一）作者的創作意圖

根據龍瑛宗的專訪報導〈中央文壇的彗星／〈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作家／訪龍瑛宗〉[12]可窺知他的創作動機、讀者的設定及題材選定的問題。

關於小說的主題設定：

> 寫實地處理中學畢業本島人知識分子的形象，及其背後的社會性、經濟性的關係，是我想書寫的東西。以苦惱於生活在封建殘渣中的知識分子的生活為主題。

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中學畢業的青年，作者將他們視為「本島人知識分子」。當時殖民地的本島人公學校的就學率並不高，中等教育的體制尚未完備，往高等教育機關升學更加困難。因此根據當時台灣殖民地教育的實況，的確「中學畢業」的青年就堪稱是「本島人的知識分子」，但是當時日本文壇多數的評論者並未認定主角陳有三是知識分子，關於這點留待下文再行詳述。二是，「背後的社會性、經濟性的關係，是我想書寫的東西。」小說中因為「本島人

[11] 山田敬三、下村作次郎、賀淑瑋、李郁蕙、和泉司等人皆曾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進行精闢的論述。

[12] 〈中央文壇の彗星／「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の作家／龍瑛宗を訪ふ〉，《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7 年 4 月 6 日。

沒有房租津貼，甚至連薪資也很低」、「戶籍上如果是內地籍的話，官廳將加俸六成，還有其他津貼有利可言」等內台薪資差別待遇的描寫，即是殖民地的社會性現狀。而在工業資本社會中，人的勞力價值皆由「薪資」換算而成，社會性的歧視與經濟性的差別待遇成為身處於薪資階級的小知識分子的切身問題。殖民地的小知識分子的絕望感與苦悶，即是從那樣的經濟條件醞釀而出的。因此文本中小說人物的薪資、生活費、聘金的金額等才會不斷地詳細如實地被數算著，台灣小鎮在資本化的過程中，人的社會價值不斷地以「貨幣」被衡量制約，同時間接地反應出台灣社會經濟體制的轉變。而「以苦惱於生活在封建殘渣中的知識分子的生活為主題」的意圖，主要則表現於批判「聘金制度」、「早婚」、「婚姻買賣」等在台灣封建社會中常見的陋習。

預設作品讀者將會影響作者書寫策略的選定，《改造》懸賞創作獎是日本內地具文壇指標性的文學獎項，因此書寫者自然而然地將讀者設定為對台灣殖民地風俗民情不甚了解的內地日本讀者為主。在選材方面則試圖跳脫日本雜誌中既有的描寫「台灣蕃人生活」的模式，希望介紹佔台灣多數人口的本島人的生活，引發內地讀者對異國風情的興趣，故以寫實的手法將「本島人實際的生活」細緻地呈現出來。同時，他也提到因個人生長於市鎮的背景，使得他即使想寫農村的情況，也無法下筆。因此只能選取他最為熟悉的小知識分子生活作為書寫題材。

語言的選用對殖民地作家而言，一直是個重要的課題。使用學習而來的「國語」，「將本島人的生活呈現出來，使得行文不甚通順」，可見以「國語」行文「窒礙不順」的困窘感覺，從〈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即開始困擾著殖民地作家龍瑛宗，但他在文學路上仍執著地不斷滾動著那塊「語言」的大石，只是戰前的是「日文」，戰後是「中文」罷了。

（二）〈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文學主題

龍瑛宗曾提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以他任職於台灣銀行南投分行[13]時期（1931 年～1934 年）的生活體驗為題材，在群山環繞的南投盆地開始醞釀創

[13] 根據名倉喜作的《台灣銀行四十年誌》（1939 年 8 月），南投支店創設在大正 7 年（1918 年）11 月 1 日。所在地是台中州南投郡南投街南投百二十二番地。

作小說的動機[14]。〈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共五十八頁，十四段的中篇小說。其內容主要以走向近代化的殖民地台灣社會為背景，描寫在中日戰爭前夕的台灣本島知識分子的處境及其苦惱。

主角陳有三以優異的成績自中學畢業後，考取鎮公所會計補助的工作。進取的他在工作之餘勤奮自學，希望隔年能夠通過文官普通考試，採行十年計畫立志考取律師資格。但事與願違，客觀的現實讓他的青雲之志漸失，從經濟的因素到失戀的悲劇接踵而來，而這些遭遇似乎是他身為「本島人」的宿命一般。文本中在描寫本島人的風俗民情、南國風景等之外，陳有三因立身出世的大夢幻滅的經過，及其身旁各類型的小知識分子的生活樣貌，或是標榜享樂主義，或是屈從默默忍受舊封建社會的陋習。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以兩條軸線是共構而成，一條是台灣風土民情的描繪，一條則是關於中學畢業的殖民地社會的「新中間層」[15]的描寫，因此以下將進一步探討作者如何鋪陳這兩條軸線，構築出小說的層次感。

1、關於木瓜的描寫

李郁蕙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作為一個「場域」以殖民地中政治力學的觀點進行分析，指出龍瑛宗透過重層構造的歷史敘述，捕捉這個「小鎮」上日本、漢民族、原住民的勢力消長及其內部的關係[16]。筆者則側重於「木瓜」樹等的文學象徵意義，考察透過「木瓜」樹等的描寫，殖民地作家提供日本讀者怎樣的台灣殖民地風景想像。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象徵的台灣風景的木瓜樹，既非殖民地重要的經濟作物甘蔗，也非日本人偏愛的水果香蕉。龍瑛宗為何以「木瓜」樹作為台灣代表性的植物進行刻畫？關於這個問題下村作次郎曾借用尾崎秀樹「從

---

[14] 龍瑛宗，〈最初的經濟調查〉，《大華晚報》，1988 年 2 月 1 日。

[15] 「新中間層」一語的概念參閱永嶺重敏的〈サラリマ——讀者の誕生〉，《モダン都市・讀者空間》（東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2001 年 3 月），頁 203-243)。指出雜誌讀書層分為知識階層和一般農民，但在昭和大正時期出現了所謂的新中間層，即是都市的薪資階級和農村的教員。殖民地的現代化過程中在市鎮中亦逐漸出現新的受薪階級，因此筆者將他們稱為「新中間層」。

[16] 李郁蕙，〈植民地の政治力學と「場」の表象——龍瑛宗「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比較文學》第 42 卷（日本比較文學會，2000 年 3 月 31 日），頁 62-75。

抵抗到放棄、屈從」的觀點，認為〈植〉中所描寫的木瓜即是台灣人的精神風貌[17]。

但如前所述，龍瑛宗的創作動機之一是，為了向內地讀者介紹台灣島人的生活，而選用「木瓜」作為題應有為營造鮮明的異國情調的創作目的才是。因此他在書寫台灣風土時，試圖於描寫殖民地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絕望與苦惱的過程中，寓情於景、借景抒情，在綠色豐饒的南國風景和敗北的殖民地青年形象間產生強烈的對照關係，以突顯殖民地人文自然風景。

首先，就龍瑛宗在小說中如何描寫「木瓜」，吸引日本讀者的注意，而其中又隱藏著怎樣的作者寓意，暗示殖民地青年的生命困境？作者最先讓木瓜樹出現於小知識分子們所嚮往的日本人的文化住宅內，接著描寫是出現在一般人皆可進出，種植著熱帶樹的公園，草地旁自然地長著的木瓜樹群。文本中言及聘金制度的問題時，遠房親戚的少女卻端來了雌株木瓜樹所結的果實而來，其中似乎充滿著早婚的暗示。其次，在平鋪直敘「舊行政區的廳所在地」H 鎮的開拓史、地理、物產等時，「豐饒充滿綠意的南國風景」映入眼簾，而覆蓋著台灣土地的樹種中，木瓜樹竟也顯而易見。而與「白色牆壁富農的屋舍」相對照，生長在貧農傾倒的荒屋中的木瓜樹，充滿著生機結實纍纍矗立其中，在崩壞中突顯其繁茂。抱持社會主義理想的林杏男的長子卻以「腐壞的水果」的氣味來形容鎮上停滯酸腐的空氣。最後，當陳有三意志消沉呆坐公園的長凳時，木瓜樹的葉影則映落在他的心田中，文本再度迴向至木瓜樹的描寫，讓它成為撫慰陳有三靈魂的象徵。

木瓜樹無論在日本人的文化住宅區、普通的公園、貧農的荒屋旁，或者在自然豐饒的南國中無不亭亭聳立。「腐敗的水果」雖足以象徵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文人的墮落[18]，但是若考慮作者的創作動機及小說題目〈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所暗示的異國奇木，「腐敗的木瓜」的小鎮似乎並不足以概括龍瑛宗所欲呈現的南國「小鎮」。

---

[17] 下村作次郎，〈戰前台灣的文學風景之變遷　試論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收入「紀念孫中山誕辰 130 周年『孫文與華僑』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1996 年 11 月 29 日、30 日。

[18] 陳芳明，〈南國崩壞〉，《台灣時報》，1994 年 3 月 15 日。

作者在文本中透過場景的描寫，不斷地暗示殖民地社會空間的差別性，如在台日人的文化住宅的舒暢和一般台灣住的「豬窩」般的生活環境間的對比；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除了薪資的差別待遇之外，居住空間亦是被隔絕的。木瓜樹最初雖然出現在令人稱羨的空間日人住宅的牆垣之內，但之後的木瓜樹、果實、葉的各個場景描寫中，隱含著作者的寓意，最後，「木瓜樹」仍回歸南國豐饒的土地，公園內綠意依舊的木瓜樹台灣的原生風景，撫慰著陳有三幻滅絕望的心情。總之，「木瓜」在小鎮的生活空間中，果實纍纍地被配置在其中，打破殖民地空間國別與階級的差異，挺立其中繁茂依然。

文本最後，以陳有三「想起死去的長子的話語，如黑暗洞窟的內心，颯然吹進一陣涼風，突然發現自己直哆嗦著。」作結。而這樣的作結中似乎充滿著作家的言外之意。若將上所述「木瓜」果樹描寫的變遷與陳有三心境的轉變對照思考的話，陳有三在公園中回想起長男的贈言「個人的力量相當的微弱，但在可能的範圍內，非得正確地改善生活不可。」、「現在雖然無現的悲哀，但不久美麗的社會將會來訪的。」，似乎暗示著救贖之道不是彼岸的「植有木瓜樹的日本文化住宅」，而是此岸「植有木瓜樹的公園」。雖然陳有三不斷地蔑視我族自我異化，但林杏南長子最後的遺言在他絕望的當前卻提供一個「美麗的社會」想像，樂觀地提醒他此岸才是自己安身立命之處，或許也意味著回歸此岸改善當時台灣社會才是生活的正道。

２、殖民地的新中間層

摹寫殖民地青年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書寫重點之一，這些青年經常作為龍瑛宗文學的知識分子類型被討論[19]。以下將回歸文本的歷史脈絡，探討在文本中龍瑛宗如何描寫殖民地青年的煩悶？

---

[19] 山田敬三，〈哀しき浪漫主義者——日本統治時代の龍瑛宗〉(《よみがえる台灣文學》，東京：東方書店，1995 年 10 月)，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所描寫的知識分子類型分為「挫折型青年」、「俗物型青年」、「破滅型青年」。呂正惠，〈龍瑛宗小說中的小知識分子形象〉(師範大學國文系「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台灣文學與社會）論文，1996 年 4 月)、陳建忠，〈殖民地小知識分子的惡夢與脫出——龍瑛宗小說「黃家」析論〉(第三屆府城文學獎文學評論正獎，1996 年 7 月)、江仁傑，〈龍瑛宗、呂赫若小說的台灣知識分子與階級〉(《台灣歷史學會通訊》6，1998 年 3 月）等中亦紛紛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知識分子形象進行討論。

(1) 新中間層的生活樣態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所描寫的殖民地青年，大都是接受過新式教育，中學畢業程度，未曾留過學的青年居多[20]，稱不上是台灣社會的菁英階層。中學畢業是他們唯一的「學歷資本」。他們任職於殖民地體制的行政機關如鎮公所、製糖會社，過著領取「月薪」的生活。是台灣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新的一批殖民地的「新中間層」。

而台灣殖民社會如何培植這些新中間層呢？根據林鐘雄的研究，他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經濟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隨著台灣產業的發展，總督府不得不培育發展台灣現代產業的勞動者、下級官吏、中間技術人員等，充實學校教育勢在必行。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便陸續在各地開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等[21]。過去對台灣男子開放的高等普通教育機關，只有國語學校語學部。隨著時勢的變化希望設立中學校的呼聲日益高漲，甚至在一九一三年台灣有志者連署請願要求下設立公立中學校。一九一五年各自訂立台灣公立中學校規則。一九二二年根據中學校命令的發布，中學校數從過去的兩所增至八所，一九四四年公私立中學達二十二所，學生人數達一萬五千名[22]。但即使如此，當時台灣人的中學校升學率並不高的情況下，當時中學校畢業的學歷並不低，而〈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殖民地知識青年即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被培植出來的一群。他們有的是下級職員任職於鎮公所的陳有三、蘇啟芳、林杏南，接受新式教育的戴秋湖，有在近代產業 M 製糖會社任職的洪天送，有 S 貿易公司任職的廖清炎等人。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將文本時間設定於第一次世界經濟大恐慌的時期，失業者眾多的年代，「病懨懨的小鎮相呼應的寂寞」。文本中如何安頓這群殖民地青年，他們又擁有怎樣的價值觀、社會觀？以下將逐一探究作者如何描寫殖民地的新中間層。

黃助役「只有公學校畢業的學歷，好像為當助役動用不少關係，對我們下屬則非常神氣，但是遇到上司或內地人一反常態殷勤地家畜般的卑屈。總之他

[20] 除了雷德是內地的某大學畢業者。
[21] 伊藤整，《台灣——四百年の歷史と展望》(中公新書，1993 年 8 月)，頁 115-116。
[22] 鍾清漢，《日本植民下における台灣教育史》(多賀出版社，1993 年 2 月)，頁 122。

討好上司的方式是我們該學習的範本。日語都不太會說的公學校畢業的人有中學校畢業的下屬，似乎讓他的自尊心非常地滿足。」甚至，批評陳有三「立身出世」的夢想，他認為：「社會不幸的原因通常都是因為知識過剩。知識常伴隨著不滿。因此它讓對社會缺乏客觀認識血氣方剛的青少年，或是反抗社會，或是淪為自暴自棄的根本原因。因此任職於公所的與其找有知識的人，還不如找個全神貫注於職務上的人，工作確實字體工整的實用性人物。」而黃助役在市役所的存在即是「無知的機械」般的實用主義的人物。

洪天送則是「身穿如日人般的浴衣，手搖扇子。」向陳有三說到：「這裡社員宿舍，我若再忍受五年便可從那如豬欄般的小屋搬來這裡。但是其他的人就是可憐人了。這裡對他們而言，只能『望樓興嘆』而已，因為他們沒有中等學校學歷。」洪天送企圖以僅有的中學學歷來提升現有的生活，因此為了入住職員宿舍而忍受著現有的不滿。「他在世間唯一的希望是忍耐幾年之後，升上一定的位置，住日本房子，過著日式生活。而陶醉它的愉快、得意之中，瞇眼含笑著。」將過日式生活作為人生的目標。

蘇德芳中學畢業後早早就結婚，薪資只有四十圓，再加上小孩很多，為家計和債務所累，生活過得很辛苦。

廖清炎「儘管衣裳光鮮，其實月薪只有三十圓的窮小子。」月薪只有三十圓，但卻對一般人都吹噓五十圓。「但其他的朋友也都差不多呢？總之，一切都幻滅了。我們不知為什麼而讀書呢？」

雷德君也「傾盡家產，好不容易畢業於內地的某大學，拿著中學教員的合格證，到處活動也找不到適當的職業，賦閒了兩年，終於來到這兒拿三十圓的月薪。」

如上所述，作者將小說人物的學歷與薪資的關係詳細地記載，甚至薪資的數據也被明記著，顯然殖民地青年的依據個人的學歷被安頓在社會的中間階層裡，他們被納入殖民體制的行政機構中，因經濟大環境不佳只能與低廉的薪資現況妥協，勉強過日。他們處於以啟蒙群眾為職志、取得殖民地政治領導權為目標的高學歷的社會菁英層和經濟生活遭受剝削無以為繼的農民層的中間，即所謂殖民地的「新中間層」，對殖民體制缺乏反抗力的一群。他們多數為台灣的封建陋習所犧牲，與社會現實相妥協，享受著屬於他們可能的生活方式。

（2）「立身出世」（出人頭地）之路的挫折

主角陳有三是位力爭上游的青年，得知市役所有職缺便迅速應徵，在二十多位應徵者的中應試通過，取得職位。他就如當時日本內地的鄉下青年一樣，胸懷大志堅信凡事努力有志者事竟成，以「立身出世」為職志。他在房間的牆壁右上角貼上斗大的字「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還掛著背著手作沈思狀的拿破崙的畫像。立志在明年之內考上普通文官考試，十年之內考上律師考試。陳有三以自修獨學的方式試圖走向「官僚之路」[23]。他這樣的信念源自於中學時代讀過的修養書、偉人傳記和成功立志傳記。「這些傳記中所描寫的人物大都出身貧困卑賤，歷經荊棘之道而累積鉅富，或成為社會的木鐸，貢獻於人類福祉。這些成功的背後都有滲血般的努力。啊，或許貧困才值得讚美的，因為貧困是成功的契機。」雖然在美夢中籠罩著時代的陰影，但他仍如此深信個人的努力是邁向成功的不二法則，他的「立身出世」的夢想也因此逐漸地被吹捧起來。

但他的中學同學廖清炎卻質疑陳有三的理想，並加以嘲諷：「從前的人單憑獨學力行便可立身出世，但現在還有人抱著這種古色蒼然的理論和理想，不得不說真難能可貴啊。」並嘲弄他「你真是可憐的光頭的唐吉軻德。難怪排了這些參考書和偉人傳、出身成功談等書籍。這樣鄉下的古老空氣，對你實在不好。」廖清炎的批評似乎也有他的道理，因此點醒了陳有三「立身出世」的大夢。但他仍無法馬上放棄他的夢想，試圖反駁道:「但假如我重要的目標在於改善自己的境遇，在這個時代的潮流中無法實現，那麼由於勤學而獲得的知識與人格陶冶的第二目標也不能抹煞吧。」「出世」若是已不可能，「立身」的努力應該是被肯定吧。

身為殖民地的青年即使想充分發揮個人能力，提昇自己的社會地位，卻找不到施力點，相反地越是發奮，結其果反而導致他們越陷於煩悶的泥沼中，若是想要從中脫困將會越陷越深。誠如廖清炎所言，「我們的未來除非有奇蹟出

[23] 根據大門正克的說法，利用講義錄自學或讀夜校的青少年中，通常以取得以下的四種資格作為目標。第一是走向繼續升學之路，第二是取得教員資格，第三是走向廣義的官僚之路，第四種是女性專屬的資格。女性又有護士、產婆等的資格考試。見成田龍一編，〈農村から都市へ青少年の移動と「苦學」「独學」〉，《都市と民眾》，（吉川弘文館，1993 年），頁 188-189。

現，否則必然一片漆黑。」因此，陳有三想「放棄立身出世的念頭，放棄知識的探求，拿掉我們青年的向陽性之後，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豈不是成了行屍走肉的殘骸？」他憎惡地凝視著排在桌上的立身成功談的書籍，心想那只不過是空洞的傳說而已。「有焦點、精采而振作的生活紐帶被切斷，曝曬於灰色的沙漠中的生活之路，竟如此延續到彼方的墓地，這使他焦慮地悲嘆而咬牙切齒。」陳有三只要想像到自己的未來便感到厭惡，「在他內心湧起莫名的憤怒，但沒有持續多久，便逐漸變淡，終於敗滅的黯淡心緒侵蝕著他的腳跟，漸漸高漲，開始浸溺腦漿。如同蜘蛛網上掙扎著的可憐的小蟲，一股莫名而力量巨大的宿命俘虜了他，隨著日子的增加強烈地啃噬著他的肉體。」他到小鎮只不過歷時半年（九月末至翌年三月末）已被小鎮閉塞的氣氛所感染，被「莫名而力量巨大的宿命」所束縛，身陷黑暗絕望中，與「立身出世」之路背道而馳，漸行漸遠。

在日本內地「立身出世」是下級官吏與下級鐵道員等，以些微提升社會地位為目標而苦學時的關鍵詞，對他們而言抱有這樣的野心是可能的[24]。但對身處於殖民地統治機關末端市役所，升遷無望的殖民地青年而言，「除非奇蹟出現」，「立身出世」只不過是神話。

同事林杏南考量家中現實的經濟金錢至上情況而希望將女兒嫁至可以獲取聘金較高的地方。陳有三對翠娥的愛戀思慕之情也只能不了了之。來自愛情挫折使陳有三如一隻受傷的野獸般，在荒野中遊蕩迷走，陷入更為黑暗而絕望的深淵中難以自拔，從「立身出世」的道路上敗退下來。

(3) 早夭的社會主義青年

文本中獨有林杏南的長子能夠理解陳有三「立身出世」之路的夢碎與絕望心境。林杏南的長子曾外出 T 市，半工半讀苦學而上進，努力提昇自己的社會地位甚至通過「專檢」[25]考試的苦學青年。

---

[24] 竹內洋，《立身出世主義　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東京：NHK 出版社，1997 年 11 月 20 日），頁 231-232。

[25] 對讀講義錄和上夜校青少年而言，以進入上級的學校為目標是他們取得資格的一種方式，而其中有各樣的檢定考試。例如專檢和高檢（高等學校入學資格檢定試驗）、實檢（實業學校畢業生的檢定試驗）等。其中最難的考試是專檢，專檢及格後進入專門學校，甚至就讀大學為目標是最高等的升學管道。見大門正克，〈農村から都市へ青少年の移動と

但他因過勞而罹患肺病，為養病而返鄉回到小鎮來，但他覺得「這個小鎮的空氣是恐怖的，好像腐爛的水果，青年們徬徨於絕望的泥沼中。」在這充滿閉塞的氣氛的小鎮裡，他藉由閱讀佐藤春夫譯的魯迅〈故鄉〉、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制、國家起源〉等，來安頓他內心的煩憂，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自我安慰。他樂觀地深信「充塞在我們眼前的黑暗的絕望的時代，將如此永久下去嗎？還是如烏托邦的和樂社會將必然出現？只有不摻雜感傷與空想嚴正的科學思索，才能帶來鮮明的答案。真實的知識解釋現象，會把我們拉進痛苦的深淵也說不定；但任何現象都是歷史法則所顯示出來的姿態，我們不該詛咒。幸福要沒有痛苦與努力將無法達成。我們處在這陰鬱的社會，唯有以正確的知識探究歷史的動向，切勿輕易陷入絕望與墮落中，非正確地活下去不可。」

在「立身出世」的道路上他是位挫敗者，但他在最後的原稿中卻寫著：「二十三歲月也許很短。我的肉體已經壞毀，但我的精神卻活了五十歲、六十歲。我足以深刻的思惟與知識解釋事物，現在雖然是無限黑暗與悲哀，但是不久美麗的社會將會來臨。我願一邊想起各式各樣人間充滿幸福的美姿，一邊走向冰冷的地下而長眠。」陳述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生命觀。

作者讓這位懷著社會主義理想卻身體孱弱的青年最後留下「不久美麗的社會將會來臨」的遺言而夭逝，似乎在他身上託負著許多隱晦不明的弦外之音。其中似乎也暗示著台灣在充滿肅殺之氣，戰爭烽火將起的時代氣氛中，社會主義運動只能如林杏南的長子般早夭而選擇長眠於地底下。這樣的時代情勢不只是殖民地台灣，內地日本未嘗不是如此，因此和泉司認為龍瑛宗很巧妙地將當時日本左翼思想狀況換置於〈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讓它符合台灣的特殊性[26]，但是和泉以日本本位主義思考這位人物的存在，小說中人物之所以埋名、訪稿〈特輯台灣文化　台灣文學を語る「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その他〉中林杏南之子之所以被空格所取代的問題、被殖民者的言語表述所受的壓抑問題等殖民地本質上的問題欠缺討論，單純的換置關係是不足以說明的。

「苦學」「独學」〉，頁 188-189。

[26] 和泉司，〈懸賞当選作として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改造』懸賞創作と植民地「文壇」〉，《日本台灣學會報》第 10 號（東京：日本台灣學會，2008 年 5 月），頁 119-139。

(4) 殖民地青年像的自我異化

誠如以上所述，陳有三和林杏南的長子的身上可見到猶如日本內地「煩悶青年」般，即使再怎樣拼命苦學似乎皆與「立身出世」絕緣而深受挫折。但文本中卻赤裸裸地將殖民地青年自我異化及對「我族」的輕蔑。「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不正是他的同胞嗎？僅為一分錢而破口大罵，怒目相對的纏足老媼們，生平一毛不拔而婚喪喜慶時則借錢來大吃大鬧，多詐欺、好訴訟及狡猾的商人，這些人在中學校畢業的所謂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的眼中，像不知長進而蔓延於陰暗生活面的卑屈的醜草。陳有三厭惡被看成與他們為伍的。」面對日人的歧視時「有時陳有三被叫『汝也』(你的意思含有對本島人侮蔑之意)，便蹙緊眉頭，顯現出不愉快的臉色，表現出不願回答的樣子。因此他也常穿著和服，使用日語，力爭上游，自認為有異於同族人的存在，而感到一種自慰。」的扭曲心態。

在弗朗茲．法隆的《被詛咒的大地》的第四章「民族文化」中將占領者與殖民地知識分子（作家）的關係的變化劃分成三個階段進行分析[27]。他的「三階段理論」並無法直接換置於日治時期台灣作家身上，因為台灣社會並非單純的原住民社會。但如下他所指陳的，接受殖民地新式教育的新知識分子的「文化異化」的現象，和他們內在心理苦惱的觀察，甚具參考價值。

> 為確保自我救濟從白人文化霸權中逃脫，覺得有必要恢復前所未知根本。儘管會發生什麼事，還是覺得有必要讓自己在野蠻的民眾中消失。原住民（知識分子）因此感到逐漸自我異化，換句話說，因而產生無法克服的矛盾情況，無法從自我深陷的泥沼中脫身，而拼命忘我地下決心、確認所承諾和接受的事。原住民（知識分子）發現他非得負關於自己和人們所有的責任。他不只成為擁護者，並要和其他人一起接受，而且自此他並嘲笑自己過去的怯懦。
>
> 這樣充滿苦澀的蛻皮是有必要的。因為無法實現的情況將見其他極度而重大的心理和情感的損傷。

[27] フランツ・ファノン、鈴木道彥、浦野衣子譯，《地に呪われたる》(みすず書房，1996年9月20日)，頁210-211。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角陳有三輕蔑同族的因襲、卑屈和無教養。對他而言，「唯有擁有新的知識才感覺一種矜持，才能夠俯瞰群聚於他周圍的同族們。要他放棄新知識，簡直就是令他還元於某些人所卑視的同族。要把他撞落於沒有教養而生活水準低得如同泥沼的生活，對他而言，是無法忍受。」「抽出青春與知識之後的無依無靠的生活，就像漂泊於絕望虛無之中，感到生活目標與意志飛散而去，經常像脫殼似地坐在竹床上。」根據法隆的論述，此刻的陳有三的精神狀態即是無法實現「蛻皮」而產生「極度而重大的心理和情感的損傷」，越自覺自己的身分其痛苦亦更深。即使為了打破現狀而作出許多努力，但在殖民地社會中嚴峻的制約（殖民地的政策）和高牆（差別問題）下，積極的行動和思想對現狀的突破改革並無助益，反而因現代新知而使自己更意識到自身在精神上、經濟上生活的「不幸」。因此，擁有新知識只是徒增困擾，新知識分子的自尊越高，便更難馴服在殖民地不合理的制度下，益加惱於自我矛盾。

中日戰爭前日本社會氣氛低迷沈悶，與殖民地陰鬱的小鎮所散發出來的氣氛有其類似之處。文本中殖民地青年在「立身出世」之路上的受挫經驗，其煩悶的心境似乎更易於喚起內地讀者的共鳴。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舞台畢竟是在殖民地，描寫的小說人物也是被殖民者台灣人為主，陳有三的受挫經驗與內地青年的受挫經驗更形複雜，無法被等同視之，深受新式教育的陳有三雖然深信讀書對其社會地位晉升是有幫助的，但在帝國殖民的差別政策下，那樣的夢想似乎注定將幻滅。總之，〈植〉是篇描寫生活在那個絕望年代，充滿壓抑閉塞的殖民社會裡，那群處於社會新中間層青年的鬱悶，和他們面對殖民現代化與屈就於傳統陋習的矛盾心境。

四、日本文壇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評價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得獎之後，日本內地的報紙副刊和雜誌的文藝時評中紛紛刊載各方評論的文章[28]。評論者因各自的文學觀和對殖民地現況的預先理解程度，對〈植〉的評價也有著相當大的歧異性。關於各家論述的特徵和個別性無法一一介紹，只能從中歸納各家評論的共通點和引發他們共鳴的部分，並釐清殖民地作家的文本在宗主國文壇被閱讀的可能。

[28] 請參閱附表。

這些評論家之所以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作為討論對象的共同理由，都是因為它是刊於《改造》四月號是「《改造》懸賞創作獎」的獲獎作品。評論的內容主要圍繞在作品的藝術表現、題材、主角定位及論者對〈植〉的讀後感等陳述上，因此以下將分項作進一步的討論。

（一）關於小說藝術表現的評價

關於〈植有木瓜樹小鎮〉的藝術表現，有以下各評論者的意見[29]：

1、在小說的結構方面多少有些鬆散，並不熟練，沒有華麗耀眼具戲劇性的場面，也沒有鼓動熱情的旺盛精力。就因為如此所以未必一定可以從其中找出所謂藝術性的價值。（阿部知二）
2、文筆不甚流暢，結構也非巧妙。而且當小說人物冗長地談話時，在表白中作家的主觀性卻顯露而出等，就現在的階段而言，還不能說作者臻至熟練。（森山啟）
3、文章簡明，情景也顯露得很好。在會話方面，雖有一些可有可無的地方未被省略的部分，但作者的熱情卻可以彌補它。（葉山嘉樹）
4、其中有很多利用會話說明的地方，若對本島人生活感興趣的讀者而言，也可以毫無怨言地讀通的。但是讀過了二遍、三遍，這些不利的障礙因素被去除後，將顯露出這篇作品的觀察和描寫力都是乙中的程度。（杉山平助）
5、作家描寫台灣的本島人，一位中等學校畢業懷著理想的青年的人生起始，文筆雖非純熟卻很實在。（河上徹太郎）
6、將顯得滑稽而不忍卒睹。但這位作家尚未薰染日本文學的惡習，在他的文筆中出現，形成那樣文體的會話反而妙趣橫生。（名取勘助）
7、〈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當作小說則太過散漫，甚為雜亂。小說的結構很無趣。因此若極言之，這篇作品並非是小說，而僅是書寫台灣中部小鎮的小品文。

[29] 各篇評論的出處請參閱文末的附表。

雖然不能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沒有一統性。有是有但結合的連續關係卻曖昧不明。

那樣的散漫性是源自何處呢？第一是對於題材，龍君的焦點分散，集中力不足。看起來只是概念的羅列。

其次是寫法的問題。小說中的人物近似，人物性格也不十分清晰。而且作者欲將主角陳有三以第三人稱來處理但卻以第一人稱寫著。即使關於會話的部分，除了一兩個預知是演說式的地方之外，幾乎全都在未說明之下即以演說式的口氣來敘述，而顯得很奇怪。（三輪健太郎）

8、雜誌《改造》的懸賞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作為小說還不能說是成熟的作品。（海平長窓）

由上述的各段意見可知，評論者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藝術表現效果上大都未給予高度的肯定，甚至直指會話的文章太過「冗長」。若回歸文本檢討可發現，的確「會話」佔有很多的篇幅。例如第五段中陳有三被邀至同事戴秋湖家，並被推薦接受遠房親戚的女兒的婚事的情景；因婚姻買賣而犧牲的戴秋湖的妹妹的慘況。第八段中與中學時代的同學而任職於台北 S 貿易公司的廖清炎，與他圍繞著「自學」、「智識」的辯論對話的情景，幾乎都是以冗長的會話串接而成，佔了該段的三分之二強。或許因為是殖民地作家的作品，所以有些評者仍客氣地下了「作者的熱情卻可以彌補它」、「那樣長的會話還真有趣」、「文筆很實在」等的評語。

為什麼〈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由這麼多「會話」綴連而成呢？龍瑛宗自身則認為那是「因為以國語描寫本島人的生活，所以行文不甚流暢。」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以「會話」綴文，透過對話反覆辯論，反而突顯出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殖民化過程中，使用「國語」的扭捏不自然，這不也正是作為殖民地文學〈植〉的特色之一嗎？

（二）關於題材的新奇感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題材的新奇感是評論者的另一個聚焦之處，他們將它視為〈植〉之所以獲獎的重要理由之一，以下是各家的論斷。

1、台灣南部鄉下的自然、風俗、人情等極為有趣。但作者卻淺顯簡潔地描繪出來，自成一篇很好的報導文學。(阿部知二)
2、當然不只是因為題材的特異，文章簡明，情景也顯露得很好。(葉山嘉樹)
3、就題材的新奇性而言，對文學是正面的，如果作者的態度也沒有哄騙，投他一票則無可厚非。(杉山平助)
4、我想這篇小說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可以了解本島人的生活。的確，這是這篇作品所具有的魅力之一。(田畑修一郎)
5、情節很單純。以漢文味很濃，令人感到刺眼而反覆的書寫方式來描寫著台灣人的現實生活。也因為題材的奇特，相當有魅力，足以吸引讀者。但從這篇小說裏讀者所閱讀的內容，即是一般台灣的風景和人情風俗。在寫實方面這位作家具有才能。(麻四門)
6、懸賞小說或某某獎的得獎作品中，多數的題材取自國外或者是內地以外的地方，也有人因此詬病，但這樣的問題並非是最重要的問題。只著眼於題材的奇異是一種弊病，但若在文學上開拓未知的世界，文學將更形豐富。(名取勘助)

如上所述，的確，龍瑛宗注入相當的心力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刻畫台灣的景緻、台灣人的生活和風俗民情。例如建築物方面，他特意突顯殖民地台灣特有的建物 M 製糖會社「矗立煙囪的工廠巨體」、「赤煉瓦的鎮公所」、連翹的籬笆圍繞連綿並列著的「內地人住宅」、台灣的街道的「停仔腳」(台灣市街中特有的建築樣式如迴廊般)、「土角」(台灣的房子用泥土建造)、「房舍是本島人常見的凹形構造」、「土角造的，但好像建不久，混著稻殼和泥土塗抹的牆壁的紅褐色顯得穩重，房間是泥土隔間而有些潮濕，但就本島人的房子而言，窗戶是較大的。」、「陳有三被請進客廳，正面掛著觀音菩薩像，兩邊的牆上卻貼著各樣姿態的上海美女海報。」等的描寫，文中採用台灣話的發音並在文中以括弧夾注說明，同時強調台灣建築的特色，試圖在多音交雜中渲染出異國風情。在飲食方面「過了豬肉店，是掛吊著燻製烤雞和暗紅色的香腸，是讓人目眩的食慾風景……。」甚至咀嚼檳榔吐和紅黑色檳榔汁的樣態等也一一被寫出。而身穿古風的長衫(儒學者般)，但那件長衫卻污穢破舊不堪。在聽覺方面又有「年輕的男子以巧手拉

著胡琴」、「年輕的少女敲著台灣琴，……，她彈奏的曲子好似古代支那的悲歌。」等的描寫。在文本中對台灣獨特風景和人情風俗等進行細膩的刻畫，以便讓內地讀者更易於想像殖民地台灣風情以滿足讀者對於台灣的南方想像。進一步的說明以利於讀者閱讀。因此，「對本島人生活感興趣的讀者，將可以順利的讀通。」綜觀上述的批評，作者希望「如實描寫本島人生活」的創作動機，是能夠為內地讀者所接受的，誠如杉山平助所言「這篇作品可以說已達到它的目標之一。」只是台灣社會下階層百姓的前現代生活方式、萎靡不振的殖民地青年形象及作者對台灣傳統陋習的批評，雖然台灣評論者無法接受如此的負面殖民地書寫，但內地論者卻未對這些人物或議題多所著墨，其中似乎也反映出，大多的日本評論對殖民地文本的閱讀重點所在，仍停留於本文所提供的南方異國想像。

（三）關於主角的人物形象

作者龍瑛宗將主角陳有三視為「中學校畢業的本島人知識分子」的形象進行描寫。殖民地的中等教育大多限於程度較低的實業教育，顯然就是愚民政策，因而遭到強烈的反彈。一九二〇年之後因考慮朝鮮人、台灣人的教育要求，為完備中等、高等教育而在台北和京城設立大學。但是由於以日語進行入學考，所以朝鮮人、台灣人的升學者在人數比例上還是少數，現代教育政策主要仍停留在培養殖民地行政機關中的末端的官吏。因此在鎮公所裡上班輔助日本人（金崎會計）的陳有三即是接受這樣的殖民地教育所培育出來的「末端官吏」，因而可將他視為「殖民地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不單是中學校畢業的青年而已，他也象徵著接受新式教育的「本島人青年」在殖民社會裡，晉升無門又無法逃脫舊封建社會的詛咒，四處碰壁而絕望的處境，但由於內地讀者對殖民地的教育現況不甚了解，以下是各評論者對陳有三身分的理解。

1、中等學校畢業的台灣青年（阿部知二）
2、單純的殖民地青年（本多顯彰）
3、夢想立身出世的青年（葉山嘉樹）
4、台灣本島人（杉山平助）
5、年輕有才華的一位本島人、年輕的本島人（森山啟）

6、中等學校畢業的理想家風度的青年（河上徹太郎）

7、中等學校畢業程度的本島人（名取勘助）

8、中等學校畢業的年輕的知識分子（三輪健三郎）

除了 8，多數的評論者並未確切地指稱主角陳有三為「本島知識分子」。如森山將他視為是一位「無法忍受同族的因習、卑屈和無教養」的青年才俊。日本文壇多數的評論者只將視他為低學歷的中學畢業生，並不認為陳有三足以稱作「本島人的知識分子」，而使他們無法觸及殖民地本島人知識分子深層的絕望與精神創傷。這即是殖民地作家與殖民宗主國的讀者之間的齟齬，及其難以跨越的鴻溝，也就是殖民地文本與殖民國讀者間存在的閱讀難題。

（四）作品的讀後感

雖然有多位評論者，未能對作品中陳有三的絕望產生共鳴，但亦有幾位對主角的苦惱有所感，並表同情的評論者。認為他的苦惱是「嚴格內省式的人道主義和具有社會性傾向的味道」本多顯彰，而日本普羅文學作家葉山嘉樹、森山啟的評論中，則可讀出他們對作者的創作意圖的理解，對主角陳有三的苦惱與絕望寄予同情的理解。在另一方面，在他們的評論中也可以感受到，在言論自由遭到嚴格限制的年代裡，他們面對描寫殖民地現況的作品時，似乎時有保留，未對殖民地政策作出任何評論。

例如，在小說的第三段中描寫有關殖民地裡台灣人生活中的居住條件的差別之處。第四段中與內地人的女兒談戀愛，結婚成為養子後便可「加薪六成」的諷刺表現，及對薪資低廉不平的描寫之處，作者認為這是「寫實地處理中學畢業本島人知識分子的形象，及其背後的社會性、經濟性關係」的地方，但他們面對台灣殖民社會中的內台差別待遇皆不願觸及，避而不談。

楊逵與龍瑛宗的對談紀錄[30]中，「林杏南的長男」的名字被挖空，但從文句脈落中可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人物中龍瑛宗明言最喜歡他。在戰後關於

[30] 楊逵、龍瑛宗，〈台灣文學を語る「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その他〉，《日本學藝新聞》，1937 年 7 月 15 日。

〈植〉的評論中這位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物一再地被提及討論。施淑曾指出這位沒有自己的名字的早夭的社會主義青年，終其二十三年的生命，是象徵著在台灣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借助「不摻雜感傷與空想的嚴正的科學思索」，來抗拒腐爛可怕的生活空氣，「以探究歷史的動向」及「歷史法則」來解除在絕望的肺疾與絕望的時代中彷徨的痛苦[31]。

但是，在戰前日本文壇的評論中卻無人言及，深究這個人物存在的意義。日本普羅文學的代表作家葉山，甚至在日本宣揚社會主義寫實主義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森山皆未具體論及這位人物，可見當時文壇的言說空間是如何的窘迫，從〈植有木瓜樹小鎮〉日人評論的傾向，即可感受到時代緊張的氛圍。

尾崎秀樹曾談到：「〈送報伕〉、〈牛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皆是用日文寫成的小說，（中略）這三篇作品若是依照年份順著讀下來，可以追溯從抵抗到絕望，甚至到屈從，台灣作家的傾斜意識程度。[32]」若單閱讀這三篇作品，的確可以發現「傾斜向屈從」，但若進一步觀察日本文壇讀者對殖民地作品的理解度和接受度的客觀因素，不也如鏡像般映照出日本文壇本身的「傾斜於屈從」的變化嗎？殖民地作家若要前進宗主國的文壇，就得隨著時局潮流自行調整文本調性不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對言論的箝制不僅加諸於殖民地作家，內地文壇亦是草木皆兵，政治力介入文學場域的災難，日本作家同樣無法倖免。因此「傾斜向屈從」是當時日台作家們共同面對的文學環境。若就此論斷龍瑛宗是「傾斜向屈從」的代表性作家，對他而言未免太沉重了吧。就當時的文壇情勢，如果龍瑛宗不以曲筆婉轉地呈現殖民地社會的現況、被殖民者的被扭曲心理，或許將無法獲得評選者的青睞，在殖民地文壇也無法出現如龍瑛宗這般的作家吧！「抗日精神」不再是解讀日治時期的唯一標準，作家被允許的創作環境也得深入了解，方能理解作家如何透過文本與他的讀者展開對話。

日本文壇的評論者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藝術表現效果的評價並不高，但是文章中卻可看出他們對作品中的台灣風土、本島人的生活、風俗習慣等卻有著相當高的閱讀興趣。作品有效地激發讀者對台灣的想像，在這點上作者似

[31] 施淑，〈書齋、城市與鄉村〉，《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 年 6 月）。
[32] 尾崎秀樹，〈台灣文學についての覺え書——台灣人作家の三つの作品〉，《旧植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1971 年 6 月 30 日），頁 242。

乎達到了他的創作目的。但是，作者欲讓內地讀者了解殖民地現狀和殖民地青年的苦悶的創作意圖，因評論者的文學觀和個人對殖民地的預先理解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閱讀結果。

這篇作品發表於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夜，當今的讀者必須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視為言論受限的時代產物，因而無論作者、評論者在文字表述上多有所顧忌而保留，敏感的讀者即使感受到作品中的苦惱與絕望，但也只能在被允許的言論尺度的邊緣游移，若有似無地陳述其批判性，字裡行間隱藏著他們對殖民地的不平等的差別待遇的同情，這些處心積慮的評論亦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文本中作者寫實地將台灣社會現代化的重要生活指標「經濟問題」、「衛生問題」提出一一進行檢視，而殖民地知識分子所嚐到的挫折苦惱和絕望的心境，其根本的原因不外是來自殖民地社會的差別待遇所衍生的問題，在一九三七年的時空中，評論者們對於「差別問題」卻無法切入。關於作者寫實地處理「作品背後的社會性、經濟性關係」的創作動機，因而無法被充分地討論。可見在殖民地社會中現代化工程無論如何地被推進，也無法消弭差別問題，只是讓它更嚴峻地續存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同時紀錄著殖民地社會即使再怎樣地「現代化」，被殖民者如何地接受近代教育，他們都得面對有形無形的差別形式，那是無法被破除的魔咒。戰前該文本因它的得獎而獲得關注，但時過境遷在當代的閱讀實踐過程中，卻仍充分地顯現出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殖民地傷痕，為那個絕望的年代留下時代的證言。

四、台灣文壇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評價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時的一九三七年的台灣文壇的狀況，根據柳川浪花的評論〈蕭條的昭和十二年的本島文藝界〉[33]中談到，一九三七年同人誌《台灣新文學》廢刊，報紙的漢文欄廢止，雖然他期待新設的報紙文藝欄能夠彌補這樣的不足，但這樣的期待卻落空了。他認為當時的設置文藝欄的四種報紙《台灣新民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日報》中，對本島文

[33] 柳川浪花，〈淋しき昭和十二年の本島文藝界〉，《台灣公論》3-1，1938 年 1 月。

壇最有貢獻的是《台灣新聞》。《台灣日日新報》雖設有文藝欄，但是因具高踏性而不對一般讀者開放，轉而刊載內地的作家的隨筆等。《台南日報》的文藝欄因為也刊載雜文，所以不能說是純粹的文藝欄。《台灣新民報》新設文藝欄時，為本島人開放紙面，應該給予本島人的文藝愛好者活躍的舞台，但該報的所刊載的本島人的作品卻很少，幾乎以內地的雜文蒙混過去，對這樣的情況讓他很失望。「總之，昭和十二年的本島文藝界是不振的一年，雖沒有可說的作品若要硬舉的話〈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壓卷之作。」一九三八年台灣文壇誠如龍瑛宗所言，是台灣本身的「文學之夜」[34]，但是「夜晚是休憩的、是內省的，其中意味著有台灣文學之夜是有助於明日的台灣文學的期待。」遲至一九三九年《台灣新民報》中篇小說特輯連載之後，台灣的文學活動才日漸復甦。以下就一九三七年台灣讀者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閱讀結果進行探討。

（一）台灣人讀者的迴響

一九三七年前後的台灣報紙大多付之闕如，因此台灣讀者對關於〈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評價如何？無法進行共時性資料的檢討，只能從側面資料的隻字片語進行推測。例如：他與楊逵在東京的對談內容。[35]

> 楊：在台灣的新聞中，圍繞著你的作品相當熱鬧。
>
> 龍：是嗎？完全不知道。有誰撰文嗎？
>
> 楊：張深切、施維堯、賴慶等人。

以上所提及的人物所評論刊載於何處？不得而知。但他們大多是台中《台灣文藝》的成員，就地緣關係而言，他們的言論刊載於《台灣新聞》的「月曜文壇」或「文藝」的可能性相當的高。在新城行弘對龍瑛宗的訪問稿中也提到「〈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內地的文壇是個問題，在島內文壇也是個問題。[36]」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究竟引起怎樣的話題，依舊不得而知。可確定的是〈植〉

---

[34] 龍瑛宗，〈文學の夜〉，《台灣新民報》，1939 年 1 月 1 日。
[35] 施淑，〈書齋、城市與鄉村〉。
[36] 新城行弘，〈台北に話題に殘す人々　新進小說家龍瑛宗氏の卷〉，《台灣藝術新報》5-1，1939 年 1 月。

的獲獎讓龍瑛宗成為當時文壇話題人物之一。他在〈作家言「趙夫人の戲畫」完結〉[37]也提到：「我曾經在〈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批判的再批判〉的拙文中，引用果戈里或魯迅等，因而被台灣的某氏說我與其他巨匠同列並置，是驕傲誇大的妄想狂。遭到那樣嚴厲的斥責當時覺得實在很悲慘，因而曾經意志消沉。」可見，當時龍瑛宗在與台灣文壇展開對話時受到不少詰難，讓他深感挫折。同時，中山侑在他的評論文中也轉述當時的島內人士具體的批判如「惡文」、「內容毫無可取」、「描寫拙劣人物的說明不足」等[38]，可見島內人士對〈植〉的獲獎似乎貶多於褒。

但根據《吳新榮日記》的閱讀私史中，吳新榮在閒暇之餘曾讀過《改造》雜誌入選的懸賞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作中，認為「作者是台灣人，這是台灣人進出日本中央文壇的第一人。[39]」由此可見，公領域的批評與私領域的論斷似乎有其落差，但因個人的閱讀心得資料取得不易，所以以下就刊載於報章雜誌上的批評意見分成台灣報導記事、台灣人的評論、在台日人的評論作進一步的綜合分析討論。

１、台灣的報紙記事

根據筆者的管見，只見到《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的〈中央文壇彗星／「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訪問龍瑛宗〉（中央文壇の慧星／＜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の作家／龍瑛宗君を訪う）和龍瑛宗個人剪報所藏《台灣新民報》〈台灣文壇的新人／登上颯爽、檜舞台／劉君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改造』懸賞創作入選〉（台灣文壇の新人／颯爽、檜舞台に登場／劉君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改造》懸賞創作に入選）這兩則新聞。

在前者的訪問稿中，龍瑛宗將其創作時的讀者設定與創作動機作了明確的交代，即是他因為是參加《改造》懸賞創作獎的徵稿，所以以內地讀者作為他的讀者群，進行小說的選材工作。同時有鑑於在內地的報章刊載台灣人生活時

[37] 龍瑛宗，〈作家言「趙夫人の戲畫」を終へて〉、《台灣新民報》，1939 年 10 月 17 日。
[38] 中山侑，〈現實の問題「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を読む〉，《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7 年。
[39]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6 吳新榮日記（戰前）》（台北：遠景出版社，1981 年 10 月），頁 48。

大都以介紹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為主，他則希望在他的作品中介紹本島人的生活，並多少帶給台灣文壇一些刺激。而後者的訪問稿中，記者則對這篇作品進行以下的評價。

> 入選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被認為是以無產知識分子的戀愛觀、經濟觀等為主題，用俄國文豪契訶夫的筆觸，把台灣的地方特色百分之百地表現出來的傑作。作品一發表於《改造》(四月號)上，即在各方面引起轟動，將他喻為「台灣的張赫宙」的風聲甚囂塵上。台灣進軍中央文壇是以劉君為嚆矢。

上述的引文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則在這篇報導中龍瑛宗始被喻為「台灣的張赫宙」。二則是《改造》是中央文壇具指標性的綜合雜誌，兩人同是《改造》懸賞創作獎的殖民地作家，因而兩人得獎的意義皆被認為是朝鮮、台灣作家「進入中央文壇」的嚆矢。

２、台灣人的評論

如上所述，一九三七年龍瑛宗的獲獎曾造成台灣文壇的轟動，成為討論的話題。但整個台灣人評論家如何看待這篇獲獎作品？這只能試圖從以下的新聞雜誌的片段資料重構想像台灣讀者可能的反應。以下就土曜人、林精鏐、黃得時三人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評論進行討論分析。

土曜人在〈「普賢」、「地中海」、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40]一文，其中針對第四屆芥川文學獎的得獎作品〈普賢〉、〈地中海〉和《改造》懸賞創作獎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進行評論，他認為「今後正確的文學體裁應該接近廣泛大眾的，真實的傑出的體裁不是高蹈的，而是徹徹底底大眾的，而又藝術性地琢磨過的平易，真確而精煉的。」由此可知，論者的文學觀是傾向於文學大眾化的。

論者對於〈植〉質樸的寫實技法給予肯定，對於「作家的態度」和「作家之眼」皆未能認可，關於作家今後的成長似乎也略顯不安。論者對於這篇得獎作品並未予以正面的肯定。

---

[40] 土曜人，〈「普賢」「地中海」及び「パパイヤのある街」〉，《台灣新文學》2-4，1937 年 5 月。

其次，林精鏐發表了〈不備溫床的台灣文壇〉[41]，檢討一九三七年的台灣文壇，其中也評及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整體而言，他對當時台灣文壇環境並不抱樂觀的態度。同時，觀察日本中央文壇的動態，進而討論當時台灣文壇的集團性文學集團的活動實況，而將呂赫若〈牛車〉的發表和龍瑛宗的獲獎被視為台灣作家「個人性活動」的成功實例。

> 至今台灣文壇的集體性文學團體大體是弱的，相反地若檢討默默採取個人行動的同志這一方面的話，有時會令人發出驚嘆之辭。呂赫若氏的〈牛車〉刊載於《文學評論》，突然席捲整個台灣文壇，引起了一大轟動。呂氏的〈牛車〉即使現在也是公認的傑作。主角楊添丁的生活的逼真感強烈地打動我們的心。呂氏在發表〈牛車〉之前也是位完全的「潛行的行動者」。因此無法附和媒體的同志也不必喪志。《改造》四月入選之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作者龍君在這之前也是完全隱遁的文學者，並非集團性的行動。

龍瑛宗進入台灣文壇時，台灣文藝聯盟已解散，「集體性的文學團體」已疲軟，「個人性的行動」是被期待的。台灣文壇再次正式進入「集體性的文學團體」的時期，得等到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成立，在這段「空白」期間，龍瑛宗卻積極地與內地改造社與文藝首都社進行交流[42]，文壇再次進入集團式的活動時，他才逐漸將自己的作品發表空間轉移至島內。從龍瑛宗與文壇的互動關係中可窺知他在台灣文壇從「個人式的活動」時期轉移至「集體性的文學團體」時，是位善於有效地保有個人發表空間的作家。

林精鏐綜觀台灣文壇的現狀，肯定〈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出現，根據現實主義的藝術觀，概括性地對〈植〉進行批評。以下是主要的評斷內容。

> 小說的構成上至今的缺憾大體的通弊都在於後半的形象性不足，而龍氏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後半亦有形象性不足的問題。若整體檢討的話，或許在小說的技術性構成方面也許至少有八十分左右吧。創作之際

[41] 林精鏐，〈溫床をもたぬ台灣文壇〉，《台灣日報》，1937 年 4 月 27、29 日。
[42] 王惠珍，〈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之旅〉。

> 我們始終都得精力充沛不可。但若檢討台灣文壇的作品，前半可說稍稍無可非議，但後半的話，卻出現由無可言喻的無用無聊的文句綴結而成的情況。因此在這裡秉持耐性堅持到底可說是唯一的武器。
>
> 綜觀社會一般的趨勢，以寫實主義來描寫是最無可非議的，同時非拋棄紙上裝飾性的美麗名文不可。這一主題在現在或是將來都是同一理。以寫實性的筆觸描寫、充滿鄉土色彩當推龍氏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篇完全符合期待，如此評價並不過言。

總之，在林精鏐的評論中對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未持任何偏見，而是將他視為採個人行動的潛行文學者，並肯定小說中鄉土寫實的成就。

龍瑛宗一九三七年獲獎之後，黃得時所主編的《台灣新民報》「文藝欄」成為他重要的發表園地，兩人的互動關係亦是建立於此時。在一九四三年《台灣藝術》十二月號「本月人物」中專題介紹龍瑛宗。其中文中憶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改造》懸賞創作獎時，《台灣新民報》以三段式的大標題報導，讓當時作家們甚為驚訝，龍瑛宗到底是誰？忽然成為文壇的話題核心。由此可見，龍瑛宗的獲獎給當時島內作家們的震撼不小。黃得時也相當肯定龍瑛宗獲獎的意義，因為「他這樣一位新人的作品與一流作家的作品並列，刊載在日本最高的綜合雜誌之一《改造》之中，在台灣是第一回，因此意義極大。」除此之外，他認為「龍瑛宗年輕時生活在鄉下，在鄉下學習國語和修習文學的困難，不必贅言。內地某位作家將本島人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程度，視為殖民地國語運動成功的實例。」可見，黃認為〈植〉的獲獎意義，不在於作品本身，從殖民者的角度而言，它可視為「殖民地國語運動」成功的實例。尾崎秀樹在〈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中曾提到台灣文學的「第三期（1931～1945）的特徵是南進基地台灣的自覺、內外都高昂，台灣的日語教育普及，從實用性的理解進一步到達鑑賞、創作的境地。」[43]的確，龍瑛宗的獲獎可視為宗主國在殖民地實施國語教育成功的實例，象徵著台灣文學被收編進入日語帝國的範疇之內，因「國語教育的成功」，進入日本中央文壇成為他們矢志努力的目標，但一方面

[43] 尾崎秀樹，〈台灣文學についての覺え書——台灣人作家の三つの作品〉，《旧植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1971 年 6 月 30 日），頁 242。

不也正突顯出殖民地作家的創作困境亦根源於此，「日語」成為他進入帝國文壇唯一的選擇，得費盡心力在於學習「日語」和文學表現的模仿上，以求達到與帝國文壇水準相符的文學表現能力？在龍瑛宗戰爭末期的小說〈歌〉中，那位勤於學習日語的主角李東明身上，即顯露著眾多殖民地作家在學習帝國語言時的心境與困境[44]。在此黃得時點出了殖民作家在語言學習上的難處，而他「並不否定〈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以台灣為素材是它的強項，但作家的努力是不能忽略的，龍瑛宗雖不見其才氣煥發，但卻是位相當的努力者。」作為殖民地「國語教育成功」的實例的龍瑛宗在戰後嚐盡了「跨語」的苦果，這樣被語言跨越的悲哀，在他獲獎之初似乎預告著殖民地作家的文學宿命。

（二）在台日人的評論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得獎也引起了在台日人的關注，筆者以現存的報紙資料秦伸彌（濱田隼雄）的〈文藝時評「植有木瓜樹的小鎮」〉[45]和中山侑的〈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46]作為題材，試圖釐清在台日人對〈植〉的閱讀觀點。

濱田隼雄（1909～1973）於一九二四年初此來台旅行，一九二六年進入台北高等學校文科乙類就讀，一九二九年進入東北大學專攻日本文學。畢業後，曾在東京擔任《實業時代》的兼任記者，因對日本內地新聞界失望，又經歷了日本的不景氣和左翼運動的挫折，於是在一九三三年攜母來台，同年五月於台北私立靜修女子高校擔任國語教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轉任台南州立台南第一高等女子學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調任到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校教諭，擔任國語、公民、教育等科目。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台南時結識《台灣日報》學藝部的編輯岸東人，在他的邀稿下，他才試以秦伸彌為筆名寫了這篇〈文藝時評「植有木瓜樹的小鎮」〉[47]，而這一篇也是他的台南時期評論文的處女作[48]。當時濱

---

[44] 「在日治時代，我寫過〈無法寫作的小說家的小說〉，但矢野博士要我改題目。我自己把它改為〈歌〉這個題目。」〈龍瑛宗寫給鍾肇政的信〉（十四），《龍瑛宗全集》（八）文獻集，頁 66。

[45] 秦伸彌，〈文藝月評「パパイヤのある街」〉，《台灣日報》，1937 年 4 月 6-7 日。

[46] 中山侑，〈現實の問題「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を讀む〉，《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7 年 4 月 25 日。

[47] 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日本統治時期台灣 1940 年代的濱田隼雄文學〉（國立成功

田仍未進入台灣文壇，只是以一介住在台南的「文藝愛好者」抒發己見，因此，可將這篇評論視為一般在台日人讀者的論述。

首先，濱田對新人作家龍瑛宗的處境感到憂慮，因此提到：

> 根據《改造》的記載，龍君既非《台灣文藝》亦不屬於《台灣新文學》全然是位新人，這有些諷刺。擔心的只是如往常的島國作風，欺負繼子和事大主義交錯，好不容易才冒出的芽不被壓死嗎？一方面「非平家非人也」的自負氣勢蔓延，另一方面又盲目的尊敬而搭拉尾巴。批評的暴力和批評的貧困二者並不至於困擾作家，最重要的是希望龍君在島內的文藝界不要被本島的惡習所捲入。

濱田雖然身處台灣文藝界之外，但對島內文藝圈的生態亦多少有所理解，因此文中對於這位新人作家多少流露出聲援愛護之意。

其次，將小說主角陳有三視為「純真無垢的本島知識青年」，對小說中的殖民地青年的人物特點一一點出。在日台評論者中，雖然濱田是唯一提及林杏南之長子的人物，但他仍未對該人物進行較深入探討。讀完〈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後，卻令他想起了島木健作的〈癩〉和法國小曲〈黑暗的星期天〉。可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所瀰漫著的氣氛與轉向後的島木的〈癩〉和三十年代帶著濃厚歐洲的憂愁的法國小曲讓濱田憾憾然。〈植〉中描寫的殖民地的閉塞感之所以讓濱田有「絕望的同感」，或許是來自於他在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敗經驗，而他將眼光關注在台灣現實上，以肯定作家的生活態度為出發點，也認為作品中的苦惱是來自於真實生活中的煩惱。

日語對台灣作家而言並非母語，是殖民者的語言。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若要完全克服言文不一致的問題，極其困難。身為殖民地的中等學校國語教師的濱田在文中也肯定龍瑛宗以日語書寫殖民地社會現實的努力。

作品中關於聘金制度的問題龍瑛宗多所著墨，在他與楊逵的對談中也提到「關於交付聘金的場面描寫，被斥責得很厲害。這與事實或許有所出入，

大學歷史研究所，2001 年 6 月)，頁 50-51。

[48] 濱田隼雄，〈思ひ出の處女作——出發点「南山開闢」〉，《興南新聞》，1940 年 9 月 16 日。

但是我是針對卑劣的守財奴的根性，為了引起讀者的興趣而有所誇張。」可見，文中聘金制度的描寫可能是當時本島的評論者非難的焦點之一。濱田則認為：

> 過去也有以聘金制度為主題的作品。在這裡並非主題而是副題，但為何寫起來反而逼真生動呢？那是因為不誇張也不欺瞞如實寫來。在讀者的眼前所顯現的是從現實生活中所汲取的血淋淋的形象。而且如此藝術性的形象是他相當留意於客觀世界真摯研究而得來的東西。

土曜人認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太過黑暗，對這位作為寫實主義的新進作家的成長感到憂心。但濱田對於小說中陰鬱的描寫中所顯現的「扣人心弦」卻給予肯定，讚許它所引起的共鳴，甚至令人聯想到藝術家的使命。

最後，濱田闡述作家的任務與使命，對龍瑛宗今後的發展寄予期待。

> 作家是現實的提示者，同時在一般人仍未知時，得成為較將出現的社會性潛在力更快的人為發現者、先見者。只有這樣的作家才能在陰鬱的生活中注入希望，後知後覺的詩人的污名方能洗刷。龍君的發展與這點是相關的。龍君越是對於作為先見者的自覺越強，他對現實的洞察力將越深刻，而釋放出正確的寫實主義的光輝。

濱田並且指陳作品中為何只呈現黑暗的原因：

> 從作品中感受到的分析現實力道薄弱，例如本島的知識青年的無朝氣，即是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的原因在於何處？看到對於這些的分析並不充分，這便成為作品缺乏希望的原因，若將這點視為唯一產生的不滿足，則非放大思考不可。(中略)盼望龍君認真的生活態度更加深化，往下挖掘台灣的現實，敲擊鳴放本島的文化之鐘。

濱田認為龍瑛宗對「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的原因在於何處？」分析的力道不足，這正是龍瑛宗所顧忌之處，只能在隱微處反映殖民地裡支配關係的不平等。

一九三二年五月濱田從東北帝國大學畢業後，到東京擔任《實業時代》的臨時記者，稿費每月三十圓與造船所的朝鮮勞動者一同生活，當時東京的街道正流行著法國小調〈黑暗的星期天〉的陰鬱年代。〈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似乎勾起了他在東京時尋覓不出人生出口的那段歲月記憶，因而文本中所描寫的「本島知識分子陰鬱的黑暗生活」引發了他的共鳴。日本內地的知識分子可尚從陰鬱的日本內地逃脫至殖民地，尋覓人生可能的新天地，但是殖民地青年卻徬徨無助只能在殖民地現實的泥沼中沉淪徑自「腐朽」。對此深表理解的濱田期待龍瑛宗對「作家的任務」能有所自覺，希望有顆追求光明的心。一九四〇年代兩人同為《文藝台灣》的同人，成為當時台灣文壇的主要作家之一，甚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還一起出席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這應該是濱田始料未及的吧。

中山侑的〈現實問題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刊登於《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的「南島文藝欄」上，但因為該文藝欄尚未全部出土[49]，所以只能從龍瑛宗的剪貼簿上確認該資料的存在。從文中轉引的部分，讓我們窺知台灣作家們對〈植〉的評價並不佳。

台灣論者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負面評價，中山並不以為然，但對他們心理卻甚為理解。在本島讀者的評價中，他只對〈植〉獲獎原因的臆測表示認可。因為「只要看過改造社歷屆的入選作品，大多選取題材有特色的作品。這回也因為台灣這個特殊的風景，或其部分的生活習慣，引起對那些不熟悉的選者的興趣。」但中山並不認為〈植〉只有在題材上有可取之處，而認為對〈植〉的內部描寫應該給予肯定。

> 這個故事的中心在於〈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內部描寫，以及描寫住在那裡「受過教育的年輕本島青年」的苦惱，渾然到達靈魂和肉體一致的境地，使勁地將吸引著我們，在這裡所處理的素材十分強烈，因此該給他較高的評價。而這種素材所具有的思想性不見得該高度地接受，但本島青年卻大都在這樣庸俗思想的憂悶中喘息著。知道這種現實的我們對

[49] 王惠珍，〈眾裏尋它千百度——關於《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的「南島文藝欄」〉，《水筆仔》第 14 期，2002 年 10 月，頁 30-35。

> 於那種思想的平庸性，以如實的筆觸描繪，把不能遮掩的現實揭露出來這點感受很深。

相較於只對常綠豐饒的南國風光感興趣的內地讀者，「灣生」的中山侑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所欲突顯的「受教育的本島青年」的內面苦惱似乎有較深刻的理解，進而將這群本島青年分為三類：「刻苦自勵的陳有三」、「標榜享樂生活的廖清炎」、「在忍耐服從中隱藏著卑屈的笑的洪天送」。但這樣的青年們不只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上才有，日本內地的都市中亦不難見到，而將殖民地青年的悲哀擴大解釋為具普世性的知識分子的悲哀。這個觀點與森山啟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得出〈植〉是描寫「生活中真實苦惱」的見解，亦有其相似之處。

中山侑的台灣生活經驗讓他除了對台灣知識分子的煩悶有所理解之外，並對台灣式的家族制度帶給他們的磨難亦時有所聞，因而能深刻地體認到他們的苦惱。中山的閱讀理解正突顯出在台日人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閱讀深度。

最後，中山侑認為龍瑛宗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以寫實的筆觸將「受過教育的本島青年」知識分子的悲哀、舊家庭制度的幽靈，再加上「某種偏見」三種嚴酷的痛苦，加諸在他們身上。但其中所謂的「某種偏見」中山侑意指何事？他並未作進一步的說明。是指在殖民地中日人（統治者）對台人（被統治者）的偏見嗎？中山侑一反台灣論者的閱讀結果，給予這篇作品高度的肯定。之後，他也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50]為題，發表詩作以為呼應。

濱田隼雄和中山侑以在台日人的立場觀點對該作品進行論評，由於兩人對台灣的風土民情，南方異國風景等多有所了解，因而有別於內地論者，他們的閱讀側重於小說中的那群小知識分子身上的苦惱。

濱田在東京體驗過「黑暗時代的氣氛」，因而對作品中陳有三急欲從小鎮的閉塞感逃脫出來的心境能感同身受，因個人的生命閱歷與在台境遇使他更能深入閱讀文本中殖民地新中間層的苦悶與絕望，關於台灣的封建禮俗「聘金制度」雖然進行了批判性的閱讀，但或許是受限於身為殖民地的支配者的關係，關於小說中社會性、經濟性的差別待遇的問題即使感受得到，亦未見著墨。

---

[50] 中山侑，〈パパイヤおある町〉，《台灣時報》5 月號，1937 年 5 月。

中山侑因為是在台出身的日本人，在台的社會地位介於日本人和台灣人間的夾縫中，因而他對作中殖民地的新中間層的悲哀更能產生共鳴。他將該作品置於更開闊的視野中閱讀，指出作品中知識分子的多重悲哀。這正是遠離日本內地生活在台日人對當時知識分子共同處境的另一種觀察與思考。

五、結語

對於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選為《改造》懸賞創作獎時，日本文壇對這篇作品的評價因論者的預先理解而產生不同的閱讀結果，反應不一。作者的創作動機之一，希望日本內地讀者能夠了解「本島人的生活」，但讀者卻聚焦於題材的新奇性。在滿足內地讀者對南國風土民情的閱讀想像方面，作者的書寫策略是成功的。但攸關殖民地社會的內部問題的描寫、「畢業本島人知識分子形象」，則因日台教育環境的差異，內地的讀者卻無法掌握中學畢業本島青年確切的社會位置，因此在閱讀理解這群殖民地的新中間層的苦惱時，只能從人道主義的立場進行理解。同時受限於時代的言論自由，人物背後社會性與經濟性等的歧視問題，在閱讀紀錄卻不被提及，論者只於幽微之處表達對文中人物絕望心境與社會處境的理解，此處正顯現出宗主國文壇在接受殖民地文本的侷限性。

而台灣文壇對這篇作品並未給予高度的肯定，反而是在台日人給予較高的肯定與鼓勵，並肯定龍瑛宗在文學創作上的努力。這或許與本篇作品將讀者設定為內地讀者有關。其次，因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本身一直與民族社會運動緊密結合，小說中露骨地描繪知識青年對日式生活充滿憧憬、自我異化、輕蔑我族的舉動及其自我心理的扭曲，若從民族情感層面觀之，這些描寫當然無法得到台灣讀者的認可。即使，台灣人讀者應該是最貼近小說人物的生活處境的一群，但在閱讀的過程中，由於欠缺與文本保持有效的距離，因而無法冷靜看待文本中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內在深層的絕望與悲哀，並與之相呼應。同時，在台的讀者層大都是接受日本近代教育的新中間層人物居多，小說人物身上所反照出的被殖民者異化扭曲的心態，對這群讀者而言其誇張諷喻之處猶如直指胸臆。因此，閱讀這篇作品的過程應該不會太愉悅吧！誠如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閱讀魯迅的〈阿 Q 正傳〉的感受一樣吧。

相對於內地日本論者，在台日人濱田與中山因為實際生活於台灣島上，對於本土的風土民情與殖民地社會的氛圍更形瞭解，在閱讀過程中少了一些對南方異國的想像與好奇，濱田抱持著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中山則近似人道主義的觀點進行閱讀。同時，在情感上他們較不為民族情感所干擾，因而與作品保持一定的距離，較台灣人論者更有餘裕來理解小說人物的幽暗心靈及其絕望的悲哀。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被放置於宗主國文壇中檢討時，很顯然地它的特異性最易引發讀者對南方異國的想像和閱讀興趣，而「本島的知識分子」的苦惱與絕望和文本中潛在社會背景的書寫，卻被得獎的光芒所遮掩，這是殖民作家進入中央文壇直接面臨的尷尬問題。當宗主國的讀者對殖民地作家的身份與文本不再感到好奇時，殖民地作家的文本充其量只不過是個點綴性的存在，殖民地作家欲向宗主國的讀者介紹殖民地的實情的素樸願望，也很容易被忽視。殖民地作家為保有在中央文壇的能見度就得屈就迎合宗主國讀者與文壇的閱讀興趣，身為殖民地作家的使命只能隱而不現。而在地的讀者或因民族情感等因素，在閱讀的過程，

對於這樣的文本的接受度也必然不高，因此從〈植〉的實例來看，來自殖民地的獲獎文本雖帶有獎項的光環，讓作者取得進入中央文壇的入場券，但理解殖民地社會的「真正」讀者，卻不存在。殖民地作家若以進入中央文壇為目標而設定讀者群，殖民地的我族「讀者」便可能缺席，而使殖民地作家陷入尷尬的窘境。龍瑛宗身為殖民地作家相當有其自覺性的，獲獎後他並未仿效張赫宙留在帝國文壇追求成為一位「文學家」的夢想，轉而回到殖民地文壇尋覓可能的「讀者」。

附表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初出）評論文一覽表

以下的一覽表是根據《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目錄》裡的〈龍瑛宗研究文獻目錄〉（下村作次郎製作），經製作者確認刊載雜誌、刊載年月日、訂正資料、再補上新發現資料製作而成的表格。

〇確認並訂正過的資料 ◎新發現資料 （台）：在台灣刊登的作品

	刊載日期	執筆者	篇名	刊載雜誌、報紙
	1937 年			
◎1	3 月 27 日	阿部知二	「新人の作品二つー『改造』に現れた龍、石和両氏ー」	《報知新聞》
〇2	3 月 28 日	本多顯彰	「嘘に見える真實」	《東京日日新聞》
3	3 月 31 日	葉山嘉樹	「顯かな精神〈パパイアのある街〉」	《帝國大學新聞》
◎4	3 月 31 日	杉山平助	「二つの懸賞作品ー材料の新奇さについて」	《東京朝日新聞》
◎5	4 月 5 日	森山啟	「新人の二作－頽廢の情痴と苦惱の真實感」	《都新聞》
〇6（台）	4 月 6 日	無署名	「中央文壇の慧星〈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の作者龍瑛宗君を訪ねる」	《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
◎7（台）	4 月 6、7 日	秦伸彌（濱田隼雄）	「文藝月評〈パパイヤのある街〉」（上）、（下）	《台灣日報》
8	4 月 10 日	無署名	「パパイヤのある街」	《日本學藝新聞》第 27 號
9	4 月 13 日	海平長窓	「〈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で注意を惹く二つの點」	《東京日日新聞》
10（台）	4 月 25 日	中山侑	「現實の問題〈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を読む」	《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の「南島文藝欄」
◎11（台）	4 月 27、29 日	林精鏐	「温床をもたぬ台灣文壇」（上）、（下）	《台灣日報》
12（台）	5 月 16 日	土曜人	「『普賢』『地中海』及び『パパイヤのある街』」	《台灣新文學》4、5 月合併號 2 卷-4 號

◎13	5 月	河上徹太郎	「文化月報欄の文學小說」	《文學界》5 月號
◎14	5 月	名取勘助	「小說月評」	《新潮》5 月號
◎15	5 月	田畑修一郎	「文藝時評」	《早稻田文學》5 月號
◎16	5 月	麻四門	「小說採點簿」	《文藝》5 月號
◎17	5 月	森山啟	「文藝雜記帖」	《中央公論》5 月號
◎18	5 月		「首都言」	《文藝首都》5 月
19	6 月 1 日	三輪健太郎	『改造』第九回懸賞創作賞發表とその推薦作品（一）』	《懸賞界》6 月號
○20（台）	不明	無署名	「台灣文壇の新人颯爽、檜舞台に登場　劉君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改造』懸賞創作に入選」	《台灣新民報》